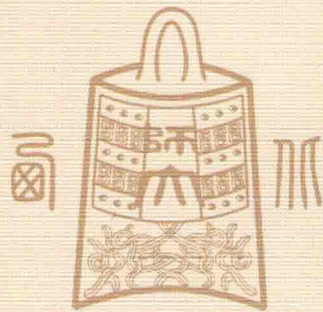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文丛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研究

冉耀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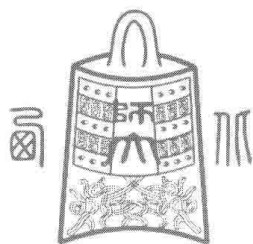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文丛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研究

冉耀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研究 / 冉耀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4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文丛)

ISBN 978-7-5203-0468-9

I. ①清… II. ①冉…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清前期②诗人-作家群-研究-陕西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194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366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一 地域文学研究视域中的清初关中诗歌研究	(1)
二 明清文学批评中的“秦风”、“秦声”	(18)
第一章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总论	(40)
第一节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的由来及作家构成	(42)
第二节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的总体特征	(50)
第三节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创作的主题取向	(76)
第四节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创作的审美特征	(98)
第二章 清初关中诗人的诗学思想	(109)
第一节 李因笃的诗论	(109)
第二节 孙枝蔚的诗论	(122)
第三节 李念慈的诗论	(134)
第四节 李柏、康乃心的诗论	(145)
第三章 “林谷观音本，乾坤老象才” ——清初关中诗人领袖李因笃	(152)
第一节 清初关中本土诗人略论	(153)
第二节 李因笃的生平经历与学术思想	(162)
第三节 李因笃的文学地位	(168)
第四节 李因笃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179)

第四章 “渊源幽雅得，不独赋秦风”

——清初关中诗人李柏、王弘撰、

康乃心的诗歌创作 (190)

第一节 “太白山人”李柏及其诗歌创作 (190)

第二节 “鹿马山人”王弘撰及其诗歌创作 (197)

第三节 “飞浮山人”康乃心及其诗歌创作 (202)

第五章 “秦声刚烈吴声缓，君能兼美无偏伤”

——清初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领袖孙枝蔚 (209)

第一节 清初关中流寓江南诗人略论 (209)

第二节 孙枝蔚的生平、交游及其诗坛地位 (213)

第三节 孙枝蔚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227)

第六章 “秦声天下稀，壮激扬其标”

——清初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李楷、

雷士俊的诗歌创作 (245)

第一节 “丁酉诗社”与关中诗人李楷、孙枝蔚 (245)

第二节 “直社”、“昭阳诗群”与关中诗人雷士俊 (266)

第七章 “从知袞衣赋，能夏振秦声”

——清初关中仕清诗人群体 (298)

第一节 清初关中仕清诗人略论 (298)

第二节 “丁酉科场案”与张恂的诗歌创作 (306)

第三节 “金台十子”之冠王又旦及其诗歌创作 (328)

第四节 “工部后身”李念慈及其诗歌创作 (343)

结 论 (354)

一 诗论方面能够继承创新，具有一定的

补偏救弊的作用 (354)

二 创作成就卓著，极大地丰富了清诗艺术宝库 (355)

附录一 清初关中诗人年表	(357)
附录二 清初关中诗人著作	(385)
参考文献	(389)
后 记	(400)

绪 论

一 地域文学研究视域中的清初关中诗歌研究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也多有差异，所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地方音乐和民情风俗。《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收集各地的民歌，供之廊庙，用以“观得失”，察民情。《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有十五国风，展现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得失。

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致认为人的气质决定于其风土。《孔子家语》云：“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丑。”^②古代思想家还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风土也紧密相关。这种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后来《汉书·地理志》、《乐志》还详细探讨了风土与人们生活习性的关系，由此引发了曹丕《典论·论文》的地域气质论。六朝时期，人们已经注意到地域与学风的关系，如《世说新语》“文学篇”、《颜氏家训》“音辞篇”都指出南北语音、学风、民俗的差异。清初顾

① 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② 张涛：《孔子家语注释》卷六，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炎武、傅山、潘耒也曾注意到南北学风和文风的不同，后来王鸣盛《蛾术编》卷二“南北学尚不同”、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曾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全面研究。然而就文学的地域特征来说，直到宋代以前，地域观念还很淡漠，文学的地域性并没有引起学者重视。因为秦汉以至盛唐，大多为大一统的集权国家，文化和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京师大夫中间，未能出现多元的文学格局。虽然中唐有了殷璠《丹阳集》这种地域诗选，但也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地域诗歌流派。文学创作中的地域差异，实际上到宋代才开始受到学界重视。江西诗派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其取舍标准在于风格而非地域，所谓“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①，但它以地域命名仍显现出地域观念在诗学乃至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清时期，随着王朝疆域的开拓，交通的发达，强大的一统国家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南方地区如江、浙、赣、川等自唐宋以来文学基础雄厚的地区文学事业持续繁荣，而且闽、粤、滇、黔等历来较闭塞落后的地区，也成为新兴的文学基地。西北、东北甚至新疆等相对南方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也出现了文学兴盛的局面。归允肃《赵云六倚楼游草序》曾云：

古今风会不同，而仕宦之好尚亦异。唐宋以岭表为荒绝之区，昌黎莅任潮阳，极言风土之陋。柳子厚以为过洞庭，上湘江，逾岭南，人迹罕至，其情词可谓蹇矣。明之仕宦无所不及，亦未见人情如此之困。今国家统一宇内，梯山航海，无远弗届。仕宦者大率乐就外郡，而尤以南方为宜。五岭以南，珠崖象郡之饶，人皆欢然趋之，与唐宋间大异。岂非以海宇宁谧，无风波之阻，为仕者乐尽其长，宜德泽于万里之外，声教四讫之所致欤？^②

① 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七十九，四部丛刊本。

② 归允肃：《归宫詹集》卷二，清光绪刊本。

他已经注意到随着交通的便利,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昔日蛮荒之地也成为文明之邦,士大夫乐于出仕岭南等地即为明证。乾隆中吴镇为王曾翼作《吟鞭胜稿序》,也对新疆在清代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局面极为欣喜。他曾说:“天之下、地之上,皆诗境也,然声教所阻,则讴歌遂阙焉。若夫声教远矣,殊方绝域睹记皆新,而乘轺持节者,于其山林水土民风物产之类,未能吟咏之万一。……新疆为金天之奥区,自汉迄明,羁縻而已。及至我圣朝,悉成编户,此诚千古所希逢,亦宁非文教覃敷之景运。将欲令昆仑月窟之左右,尽变为风雅之乾坤乎?则新疆不可无诗,而作新疆之诗者,尤不易。……先生以江左宿儒,通藉最久,一官而成一集,殆有家风。……自东而西,则由玉门、安西以至喀什噶尔、叶尔羌,其内地之诗,经前人所题咏者,先生独开生面。至新疆回部之诗,则古所未有者,而今忽有之,以采民风,以宣圣化,是非徒雨雪杨柳、感行道之迟迟也。”^①由此可见,广袤的中华大地已形成不同往昔的多元的文学格局和异彩纷呈的地域特征。

明清时期,各种地域文学流派风起云涌,蔚为壮观。明初开国,有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粤派等不同的地域诗歌流派,与庙堂诗派“开国派”、“台阁派”分流竞进,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清代文坛,除了以文学风尚为标志的“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之外,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群体为单位构成的。而诗歌流派最为繁盛,如虞山派、河朔诗派、高密诗派、畿辅七名公、关中三李、江左三布衣、岭南三大家、西泠十子、浙西六家、岭南四家、娄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吴会英才十六人、辽东三老、江西四才子、吴门七子、毗陵四子、越中七子、湘中五子等等,诗社更是层出不穷,指不胜数。可以说,地域诗派潮流的涌现,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风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②

明清时代流派纷呈、门户林立的诗歌创作,引发了文学批评对

① 吴镇:《王芍坡先声吟鞭胜稿序》,《松花庵文稿》卷二,宣统二年狄道后学重梓本。

② 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诗歌风土特征的注意，也激起了学界对诗歌的地域特征和文学传统的自觉意识。杨际昌《国朝诗话》曾云：“三楚自竟陵后，海内有楚派之目，吴庐先生一雪之；秦中自空同酷拟少陵，万历之季，文太清翔凤复为扬波，海内有秦声之目。”^① 魏禧《容轩诗序》亦云：“十五国风，莫强于秦，而诗亦秦唯矫悍，虽思妇怨女，皆隐然有不可驯服之气。故言诗者必本其土风。”^② 清代关中诗人也自觉继承和弘扬地域诗学传统，表彰先贤。^③ 杨鸾《玉堂诗钞后序》曾云：“往者富平李子德先生，嗣音北地，树帜词坛。郃阳则有王黄湄、康孟谋两先生，风格峻洁，不染恒蹊，卓然成一家之言。文章千古，公论攸存，固非乡曲所能阿好也。”^④ 可见清代关中诗人对其自身所属的地域诗歌传统的自觉维护。

明清诗人不但自觉继承和发扬各自地域文学传统和地域诗学风格，而且有意识地编选各地的郡邑诗话和地方诗文总集和选集，为地域文学的繁盛和传承推波助澜，显示出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据蒋寅《清代郡邑诗话叙录》统计，清代就有各种以郡邑文学批评为代表的诗话作品 30 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郑方坤《全闽诗话》、杭世俊《榕城诗话》、林正青《榕海诗话》、赵知希《泾川诗话》、董沛《甬上诗话》、饶仪锦《庐山诗话》等等。而各种地域诗歌总集和选集更是层出不穷，汗牛充栋。比较著名的如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陶梁《国朝畿辅诗传》、阮元《淮海英灵集》、王昶《湖海诗传》、郑方坤《岭海丛编》、刘绍攸《二南遗音》等。

（一）新时期地域文学研究的繁盛与清初关中诗歌研究之冷遇

近代以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运用现

① 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24 页。

②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九，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481 页。

③ 孙枝蔚：《张康侯诗草序》，赵逵夫点校《张康侯诗草》卷首，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④ 杨鸾：《邈云楼文集》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拾辑《邈云楼集六种·文集》，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13 页。

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地域特性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1901年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了《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论文,全面论述了中国地理与文化及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地理决定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也影响社会风俗、民族精神、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梁启超开启了近代地域文学研究之先声。1905年,刘师培发表了《南北文学不同论》,他认为南北文学之所以不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为声音,“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二为水土,“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他不但指出了南北文学的差异,而且揭示了南北文学相互渗透交融的历史进程。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继承了梁启超和刘师培等人的思想,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南北学派,北派多感情,南派富想象,而屈原取得的辉煌成就恰恰就在于他能够“通南北之驿骑”,具有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特征。王国维还在《宋元戏曲考》中将元杂剧作家籍贯进行排列,根据杂剧发展的不同时期,杂剧作家中北人、南人的数量差异,判断杂剧创作中心的转移。这也是地域文学研究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成功应用。

近人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对同光以来的著名诗派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近代诗家“可以地域系者约可分为六派”: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②他将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风尚与诗派风格结合起来论述,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开启了近代诗歌地域流派研究的先河。他还撰文专门论述了高密诗派,也开创了清代诗歌流派研究的新局面。1943年,唐圭璋发表《两宋词人占籍考》一文,对两宋词人之籍贯按省排列,论述了宋代各地词风之异。1950年,胡小石发表《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从山水文学、文学教育、文学批评等方面论列

^① 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261页。

^② 《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了东晋下迄南唐，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较早论述地域文学的研究成果。这些具体的研究实践为后来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精彩的范例。但是由于后来庸俗政治学的影响，研究地域文学一度被称为“地理决定论”并受到批判，所以很长时期地域文学研究处于停滞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的解放，许多研究领域的禁区被打破，而文学的地域研究和流派研究也方兴未艾，蓬勃发展。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的《诗的地理》和《中国文化地理》两书开启了这一时期的地域文学研究之先河。金克木先生《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也为新时期地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方法上的指导。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第三章专列“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两节，系统论述了中国文学史中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于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时代和地域的不平衡有着深刻的意义。^①而各种地域文学和流派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如李敬敏的《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和文学》（《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曹道衡的《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李浩的《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晓琳的《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钱建状《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等文章。专著如莫励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汤江浩《北宋临安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等论著,将家族、地域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创获甚大。

随着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入,明清文学中的地域和流派研究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如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 年第 5 期)、严迪昌《阳羨词派研究》(齐鲁书社 1993 年版)、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 1996 年版)、陈书录《明代前后七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邹秀容《云间词派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台湾中兴大学,1997 年)、张兵《清初遗民诗群研究》(博士论文,苏州大学文学院,1998 年)、钟林斌《公安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王富鹏《岭南三大家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等,对明清相关地域文学进行了专题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化和开拓的意义。而各种地域文学史也不断涌现,从纵的方面对不同地区的文学发展进行了认真梳理,具有继往开来的宏通史识。如陈永正《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马宽厚《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乔力《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彭放《黑龙江文学通史》(黑龙江出版社 2002 年版)、范培松《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邱明正《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聂大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其中有相当篇幅论述到明清地域文学的成就。

袁行需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曾谈到“中国文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这一现象。他指出:“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

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①其实早在明代中期,著名诗人兼诗论家李东阳已经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问题。其《怀麓堂诗话》曾说:

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幽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亦鲜矣。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有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者。而西北顾鲜其人,何哉?^②

这里已经注意到南北文学发展的差异问题,南方文学的繁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曾大兴在《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一文中也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地域不平衡问题。他还通过列表具体分析各地文学在不同时代的盛衰演变和具体原因,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相对于文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文学研究的地域不平衡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明清时期,与南方文学的繁荣发展相呼应,南方文学的研究也极为繁盛,相比之下,对于北方文学的研究极为冷清。清初朱彝尊在与王士禛书中曾慨叹:“两诵来书,论及明诗之流派,发蒙振滞,总时运之盛衰,备风雅之正变,语语解颐。至云选家通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7页。

病，往往严于古人而宽于近世，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辄当绅书韦佩，力矫其弊。惟是自淮以北，私集之流传江左者，久而日希。赖中立王孙哀之《海岳灵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隽》、赵微生副使之《梁园风雅》，专录北音。然统计之，北只十三，而南有十七，终莫得而均也。”^①可见当时学界对北方文学的轻视。清代道光年间，张维屏在编选《国朝诗人征略》时也慨叹：“二百年来陕西名人，如李楷、孙枝蔚、李念慈、王弘撰、李因笃、王又旦、康乃心全集皆未见，岂道远莫致耶，抑无人刊行耶？可见者惟《邈云集》耳。”^②而谢章铤在《答石生廉夫书》中对李因笃、李柏、王弘撰、李颀、王心敬、康乃心等清初关中学人均极为敬佩，但以不能读其诗文全集为憾。^③近代以来，南方文学的研究更是蓬勃发展，出版了许多专著和相关论文，可以说对明清时期江南、岭南、荆楚各地的地域文学流派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创了南方文学研究的繁盛局面。相比之下，北方文学研究略显逊色，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不多，出版的著作更是寥寥无几。1997年，陈书录先生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出版了《明代前后七子研究》一书，开启了明代北方文学研究的先河。2006年，陈书录先生指导黄玉琰完成了其博士论文《明末清初中州诗人群体研究》，对明末清初这一重要北方诗群做了系统研究。王小舒《清初的河朔诗派》（《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曾经详细讨论了“河朔诗派”这一清初北方重要诗人群体。杨挺《明代陕西作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师海军《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0年）、魏强《明中叶秦陇文人集团及其诗学观》（《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等，对明代秦陇诗人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胡纘宗、赵时春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开创了明清北方诗歌群体研究的新局面，但是相对于南方文学研究的兴盛局面，学界的重视依然不够。而对于清初关中诗歌的研究，成果

① 朱彝尊：《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曝书亭集》卷三十三，《四部丛刊》本。

②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二十九，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页。

③ 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四，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年刻本。

更是少得可怜。虽然清初钮琇已经提出了“关中诗派”的概念^①，而乾隆时期王鸣盛也有了“三秦诗派”的提法^②，严迪昌先生在其《清诗史》一书中也对清初秦晋遗民诗人列了专节论述，并对“关中三李一康”和王又旦、屈复评价较高。张兵先生博士论文《清初遗民诗群研究》也深入探讨了清初关中遗民诗群，对孙枝蔚、王弘撰、李柏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清初关中诗人的创作盛况具有启发意义。李世英先生《清初诗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专列“北方诸诗人的诗学思想”，论述了关中李因笃、孙枝蔚的诗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也引发了蒋寅先生对清初关中诗学的兴趣，他曾先后发表《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康乃心及其诗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求索》2005年第2期）等文章，深入探讨了清初关中诗学，贡献卓著。高春艳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了《李因笃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是新时期以来对李因笃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虽然一些学者对清初关中诗人如孙枝蔚、李因笃、李柏、康乃心等做了一些个案研究，为我们深入研究清初关中诗人群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许多清初关中诗人如李楷、韩诗、李念慈、康乃心、张恂、雷士俊等人的诗歌创作仍然没有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令人极为遗憾。

探究清初关中诗歌研究不够兴盛的问题，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远离，昔日繁华的长安已经黯然失色，只留下了“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让后人凭吊。而被历史上称为“陆海”的八百里秦川，也由于过度开垦而不再富饶。再加上时有发生自然灾害和朝廷的苛捐杂税，关中地区百姓的生活日益困苦。随着经济的衰退，文化

① 钮琇：《觚賸》卷八《粤觚》云：“关中诗派，多尚沉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7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王鸣盛：《戒亭诗序》云：“三秦诗派，国朝称胜。”刘壬《戒亭诗草》卷首，国家图书馆藏乾隆间刻本。

发展也受到了制约。明清两代，各地的官学和书院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书院教育对于培养士人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经济不发达，秦陇地区的书院也不够兴盛。大多数关中士人由于家庭贫困，甚至无法完成秀才、举人考试，更不用说远赴京师参加会试。据郎菁《陕西历代进士数量及地理分布统计分析》（《长安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统计，自隋代实行科举以来，迄清代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陕西历代共有进士2530名，明代有952人，清代有1089人。与南方科举比较兴盛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相比，明清时期陕西的进士数量大为逊色。据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统计，明清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95%。江南地区不但科举数量众多，而且科名也极显赫，被称为“天子门生”的状元在明代江南有89人，清代有112人。而陕西在明清两代也只出过3个状元。科举的兴盛虽然与诗文创作的繁盛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些科名卓著的士大夫在朝廷有机会高居台阁，左右诗坛风会，促进文学创作的兴盛。另外，这些身居高位的朝廷大员可以利用便利的机会和雄厚的财力出版自己和友人的著作。明清时期江南的刻书和藏书事业极为发达，与这些富庶的官僚士大夫的推动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明清时期关中诗人的著作得到刊刻和流传的比较少。就清初来说，李因笃《受祺堂诗集》、《受祺堂文集》、王又旦《黄湄诗选》、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李楷《河滨诗钞》、《河滨文钞》等都只刊刻过一次，流传不广。由于他们的诗文集流传不广，所以许多研究者很难见到，自然无法置评。张维屏就在《国朝诗人征略》中慨叹清初关中诗人诗文集的难觅。沈德潜编选《清诗别裁集》，因为找不到王又旦的《黄湄诗选》，只能从王士禛《感旧集》中选录几首。^①

第二，清代统治者禁毁的原因。清初统治者对汉族士人采取打

^①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五：“王又旦，字幼华。……惜未得全集，于选本中采取，故所收止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